

政治论坛

当代中东产油国的社会变迁*

黄民兴

摘 要：随着石油的开发，战后中东产油国的经济、教育迅速发展，并对其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为：游牧人数的下降和变迁；大地主阶级遭到沉重打击，转而成为资本家或农场主；小农走上合作化道路，在海湾六国采用了现代耕作方式，或大批向城市迁移；大资产阶级在伊拉克遭受了沉重打击，在其他国家则迅速发展；传统小工商业者受到猛烈冲击，“新中等阶层”不断壮大；奴隶是唯一彻底消失的阶级，产业工人迅速崛起，同时出现了大批城市贫民；官僚资产阶级是一个新兴阶级，宗教人士的传统特权受到限制；作为新兴集团的外籍人员与本国民众存在深刻对立；对于少数群体，各国采取了压制与改善经济文化并重的政策；两极分化在各国普遍存在。总之，中东产油国的社会结构在变化的同时又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

关键词：海湾地区；中东问题；产油国；社会变迁

作者简介：黄民兴，博士，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陕西西安 710069）

文章编号：1673-5161(2007)04-0011-07

中图分类号：D371

文献标识码：A

*本文属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中东现代化研究”(01JAGJW005)的中期成果。

二战后，随着石油的开发，中东产油国进入了经济迅速发展时期。同时，石油经济的发展也对相关国家的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君主制为主体的中东产油国，其传统政治基础是家族政治，主要社会基础是教俗贵族、农牧民（尤其是与王室关系密切的部落）、与统治集团属同一教派的信众和商人。随着国家的发展，统治集团逐渐调整了相应的政策，并扩大争取一般民众。因此，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多数保守的产油国也积极努力以促进社会发展，并为此推行了一系列政策，包括发展教育和医疗等。

表一 1960~1981年中东产油国各层次学生入学率的变化(%)*

国别	小学		中学		大学	
	1960	1981	1960	1981	1960	1981
伊朗	41	95	12	45	1	5
伊拉克	65	113	19	59	2	9
沙特	12	64	2	30	/	8
科威特	117	94	37	76	/	14
阿联酋	/	127	/	61	/	4
阿曼	/	74	/	22	/	/

*表中数字超过100%的，表明入学者包括留级生等非年龄段学生；斜体为其他年份数字。

资料来源：《1984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4年版，第266~267页。

产油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是重大而突出的，主要表现如下。^[1]

(1) 游牧民人数的下降和变迁。在牧区，主要变化是游牧民人数的迅速下降和部落的逐渐解体。在半岛地区，游牧民人口一直占很大比例，沙特人口中游牧民比例最高。据福阿德·哈姆扎在1933年出版的《在阿拉伯半岛的腹地》一书所载，沙特全国人口中58%为游牧民，其余为定居人口。^{[2]111}

战后，延续了几千年的游牧制开始面临严重危机：首先，游牧业的环境恶化。市场对畜牧业产品需求减少。一些产油国从国外大量进口活牲畜、肉乳制品并为其提供相当数量的经济补贴，对牧民饲养牛羊构成了冲击，而汽车、飞机等现代交通工具的推广使民众对骆驼的需求下降，沉重打击了沙特游牧民所从事的朝觐运输业。在一些地区，过度放牧造成牧场退化、干旱和沙漠化等问题，也影响了游牧民的生存能力，而始于战前的国家边界的确定，则限制了游牧民的迁移；其次，城市、油田和政府准军事力量（如沙特的国民卫队）的发展为游牧民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及良好的上学和医疗条件。同时，油田等地的固定水源也吸引牧民在周边定居，以方便畜群饮用，尤其是在夏天。90年代中期，沙特国民卫队现役人员达7.7万，且装备精良；^{[3]134}最后，政府有关政策对游牧业的冲击。各国政府始终视拥有军事力量的游牧部落（尤其是少数民族部落）为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及落后生产方式的代表，因而延续了战前的促进其定居的政策，为其提供土地和教育医疗设施。早在1925年，沙特政府就宣布废除作为主要社会组织形式的部落土地所有制，但允许他们继续使用属于自己的牧场，这一举措旨在防止各部落间的土地纠纷。另外，各国政府也努力迫使部落成员纳税、服兵役，鼓励部落酋长进城定居，并委以官职。结果游牧民人数迅速下降。1977年，沙特游牧民仅占全国普查人口的25%。^{[4]5}根据一般规律，游牧民定居首先是务农，但在海湾国家，却有许多人直接进城，跳过了务农阶段。因文化水平较低，不少人成为出租车司机、花匠、门卫、向导、国民卫队士兵、建筑工人等。大批移民造成了牧区劳动力的短缺，沙特甚至得从约旦、伊拉克等邻国输入牧民。一方面，大批对外移民削弱了部落家族关系，尽管在城市里居住的酋长与原部落仍保持着频繁往来；另一方面，部落仍然保持强大的影响，在城市中同一部落的人往往住在一起，部落家族联系有助于移民适应新环境，新的部落继续形成。^[5]留在农牧区的游牧民和半游牧民，其生活方式也出现变化。他们领取政府补助金，获得牲畜、良种、饲料补贴和购置汽车的补贴，购买了水泵、拖拉机和汽车，汽车成为游牧民不可或缺的物品，可以帮助他们运送水、牲畜，并看管骆驼，一些大牧主还添置了长途放牧所需的运水车。因此，延长了牧民在一个地方停留的时间，提高了迁移的速度。^{[4]6-7}当然，从政府政策中获益的主要是大牧主和酋长。此外，各国也出现了一批利用外籍劳动力的现代化养殖场。

(2) 定居农村的社会变迁。在农村，战后的阶级关系出现了更为重大的变动。大地主在两次大战期间一直是政治经济的主导性力量，其特点是基本上为居住在城市中的外来地主，包括商人、官员、酋长、宗教上层等，但他们在土改中遭到毁灭性打击，大量土地被政府收购（伊朗王室在白色革命前就开始出售土地）。许多大地主利用政府的赔偿，大量投资于工商业而摇身变为资本家。其他人则在保留的土地上采用机械化耕作和雇佣他人，成为农场主。

伊朗土改的目的在于把大地主的土地转入富农和小地主之手，从而把上层农民纳入政府社会基础之内，促进商品化生产的发展。土改的配套措施包括森林、牧场和水源的国有化。在土改中，小地主受影响较少，雇农没得到任何土地，且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原先佃农对租地的占有不均惯例。根据1974年土改结束时的一项调查，33%的农村人口无地，39%的人平均占地2公顷，12%的人为7公顷，14%的人为18公顷，0.5%的人为190公顷。^{[6]45}土改后成立的合作社也主要为富农所控制，伊拉克自耕农的比重更大。70年代中期，农业工人占伊拉克农村人口的3.9%，基本无地的雇工占

10.3%，贫农为 15.6%，中农为 41.5%，富农为 20.7%，农业资本家和地主为 8.0%。^{[7]405} 对于土地规模不足维持生计的农民来说，他们必须靠租用土地、出外打工、进城做事、从事手工业活动等方式补贴家用。加上政府忽视农业，土改的整体效果甚微。70 年代末以后，伊拉克逐渐改变了政策。1983 年的 35 号法通过后，集体农场减少，合作社消失，对拥有土地上限的规定放宽，对土改中接受土地的农户的控制放松了。因此，农户更易获得信贷，接近国家的批发市场，加快了自身的发展。^{[8]195} 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于 1980 年通过“土地分配法案”，没收了 5 万公顷的地主土地并租给农民，同时将 75 万公顷的贫瘠地和荒地分给农民。在沙特，小农在政府的资助下开始使用农机、化肥、良种并获得更多的灌溉用水，生产的商品化也得到发展。同时，沙特也出现了采用现代耕作方式的农场，70 年代中期以后大农场获得了政府分配的大部分国有土地，发展迅猛，成为国家信贷、生产资料和农产品补贴的主要受益者。大农场主要使用外籍技术人员和外籍工人，生产小麦和禽蛋。80 年代中期，6 家大公司控制了沙特 30% 的小麦市场。^{[9]224} 另一方面，贫农因难以得到国家信贷、地下水位下降和人口增加等因素而面临经营困境，许多人失去土地而流入城市，甚至出现了整个村庄被遗弃的情况。1975 年以后，政府加强了对落后地区的投资，向城市大量移民的情况才得到缓解。^{[3]137-140} 1990 年，沙特农牧民的总人数下降到 56.9 万，仅占劳动力总数的 9.9%。^{[3]151}

(3) **城市大资产阶级**。城市的社会结构变化较大，下表为伊拉克 1977 年城市社会结构状况简介。

表二 1977 年伊拉克城市的社会结构

阶 层	人 数	占城市总人口%	占全国总人口%
中上中等阶层			
专业、半专业人员	185, 444		
中上层公务员	198, 856		
小实业家、服务业雇员	295, 174		
小计	679, 474		
包括家属	2, 717, 896	35.7	22.6
下层中等阶层			
公务员	119, 314		
小实业家、服务业雇员	174, 150		
熟练技工、技术人员	102, 173		
小计	395, 637		
包括家属	1, 582, 548	20.8	13.2
下层阶级			
公共部门工人	218, 743		
建筑工人	295, 316		
交通运输业工人	104, 545		
服务业从业人员	187, 348		
失业者	74, 725		
小计	1, 051, 143		
包括家属	4, 204, 172	55.3	35.0

注：家属人数为小计乘以 4；下层阶级还包括其他集团，个别数字经作者合并；城市总人口为 760 万，全国人口为 1200 万。因统计误差，城市人口的三个百分比相加超过 100%，原文如此。

资料来源：Phebe Marr, *The Modern History of Iraq*, Westview Press, 1985, pp.274-6.

在半岛国家，土地资源的匮乏和部落土地制的长期存在使地主阶级势力不大（地主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商人），而商人历来拥有重大影响。他们是王室、埃米尔资金的提供者，因而享受种种优惠，并成为王室的政治顾问。二战前石油收入的增长使王室得以逐渐摆脱对商人的依赖，前者继续给予商人以经济好处，以阻止其在政治上发挥更大作用。伊朗商人在礼萨·汗时期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10]220} 在伊拉克，战后大资产阶级遭受了国有化的沉重打击，在其他国家则迅速发展。在战后初期的半岛各国，为西方石油公司和王室提供物资、承包工程成为私人资本崛起的重要途径，如卡塔尔的曼尼家族和达维什家族。^{[11]133} 此后，私人资本从国家的保护主义措施、发展计划拨款、政府采购、免税政策（公司免交所得税，只纳天课）、低息贷款、水电补贴、用地补贴、进口半成品、设备补贴、外资准入限制等一系列措施中受益。如政府往往将城市中的土地廉价转让给私人，然后再高价购回用于开发，房地产商从中获利无数。在科威特，1960~1965 年度，购买土地的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 24%。^{[12]281} 再有，由于政府规定外资必须有当地合伙人才能开办公司，本地人便可轻松入股或出任外国公司代理，坐收大笔红利。像卡塔尔的达维什家族在 50 年代即担任了奥斯汀、菲利普、邓禄普、通用电气、大众、奥迪、菲亚特等著名西方公司的代理商。^{[11]138} 在沙特，战前有一定独立性的汉志商人遭到冷遇，而与王室、官僚有密切人际和地缘关系的内志商人迅速崛起，成为国内最重要的实业家集团和政府的政治支柱。^{[13]374} 此外，70 年代的开放促进了私人资本的进一步发展。1973 年，伊拉克注册承包商达到 2788 人，1980 年，其百万富翁的人数则超过了 700 人。^{[14]283}

产油国大资产阶级有如下特点：第一，强烈的依附性。表现在对政府发展计划、裙带关系及外资的严重依赖上，多数经营效益较差；第二，崛起的迅速性；第三，构成的单一性。由于多数产油国基础很差，国家垄断了基础工业，而伊拉克又实行了国有化改造，因此除伊朗外其他国家的私人资本主要限于商业、进出口、建筑和金融、服务业，制造业方面较为落后；第四，跨国发展较早。大量的石油美元使私人资本很快转入金融业，而国内市场的有限促使其大力向海外拓展，尤其在海湾地区。如科威特在 80 年代积极从事对外投资的私人大公司有科威特国家投资公司、国际石油财团和浮图赫投资公司等。

（4）城市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状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阶级成份庞杂，包括传统的小商贩、小业主、手工业者、新兴的公务员、专业人员、军官等，后者常被西方学者称为“新中产阶级”。在产油国，尽管大资产阶级和国有企业的迅速发展与进口商品的激烈冲击并存，但传统的小工商业者仍然占有重要地位。这是由于中东传统的家族因素和经济发展的二元化等决定的。在伊拉克，1962 年大型工业企业（就业为 10 人及以上）职工占就业总数的 64.3%，小型企业（就业少于 10 人）为 35.7%；1981 年，上述比例分别为 73.3% 和 26.7%。^{[15]257} 可见，小企业依然占可观的比例。在伊朗，由于大资产阶级的发展，传统的巴扎（市场）商人遭到冷落，他们便成为支持伊斯兰革命的重要力量。

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国家职能的扩大，导致行政机构的迅速膨胀和国营企业的增加，教育和城市化的发展等，又造成了“新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从教育方面看，战后各国均经历了迅速的发展（附表），此外还有大批学生出国留学。在沙特，政府规定所有受过教育和培训的公民均须为政府工作至少 5 年，否则即违法。教育的发展为中小城镇居民进入社会上层奠定了条件。80 年代中期，沙特首都利雅得 87% 的公民在政府部门任职。1958~1963 年，伊拉克 36% 的内阁部长来自 20 万人以下的中小城市，1963~1968 年这一比例达到 63%，70 年代则高达 75%。^{[7]413}

（5）奴隶、产业工人与城市贫民。在城市的中下阶层中，奴隶是唯一彻底消失的阶层。1952 年，卡塔尔埃米尔颁布法令解放奴隶。1962 年，沙特政府正式宣布废除奴隶制。阿曼在卡布斯继

位后，也宣布废奴。

产业工人是一个迅速崛起的阶级。不过，由于产油国的制造业相对落后，他们的人数一般不多，且包括大批外籍劳工，只有两伊例外。1977年，伊拉克的工人约105万（见表二），其部门分布比例如下：政府部门4.8%，建筑业28.1%，公用事业0.6%，制造业8.4%，采油和其他采矿业1.6%，交通运输业9.9%，服务业17.8%，失业者7.1%，其他为5.5%；此外，以上数字中包括小型作坊的半熟练和非熟练雇工，制造业中为19623人。^{[15]275}在伊朗，工人阶级已从50年代的200万发展到70年代中期的400万（包括中小企业工人）。为了笼络工人，白色革命计划规定在雇佣10人以上企业中，由工人分享20%的利润，实行最低工资制，并由政府仲裁劳资冲突。1975年又提出工人分享大企业1/3的股票，而实际上参加分红的工人只占工人总数的13.8%，企业只占2.4%。但工资增长较快，1963~1972年平均年增长为7%。^{[6]14、43、37-38}在沙特，1985年仅工业部门（含建筑业、采矿业和公用事业）的就业人员就达到206.9万。由于受部落、宗教、教派、国籍等因素影响，产油国产业工人队伍内部的凝聚力较差。

然而，迅速的城市化在个别城市如伊拉克的巴格达产生了大片的棚户区。伊朗德黑兰虽然没有这样，但穷人集聚在南部的老城区，拥挤不堪，环境恶劣。城市贫民成为两伊重要的社会阶层和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在沙特，70年代中期一度也出现过因农民大批向城市迁移而无法就业所致的贫民。90年代以来，由于受教育的公民不断增长、公务员职位处停滞状态、石油跌价使私企的需求趋低、以文科为主的毕业生的专业结构、非就业人员享受的优厚待遇以及对体力劳动的厌恶，由此出现了产油国独特的“知识失业”一族。到90年代后期，这一群体人数的增长已经威胁到社会稳定。

(6) 官僚资产阶级和宗教人士。官僚资产阶级是一个新兴阶级，由国营企业的经理组成，管理着油田、工厂、基础设施和一些服务类企业，拥有相当的权力。在产油国，规模最大的企业几乎全是国营企业。国企经理的任命时常受到家族裙带关系的影响，从而影响到其素质。这些企业通过订货、发包工程等渠道与私人企业相联系，而一些国营企业的经理在离职后常会进入私人企业任职。

相反，宗教人士是一个传统的、权力显赫的社会集团，曾长期控制教育、司法大权和大量土地、不动产，宗教学校的毕业生也是官僚的重要来源。然而，战后现代教育的迅速发展、司法的世俗化和宗教阶层的官僚化逐渐限制了他们的传统特权。在沙特，1970~1971年度培养宗教法官和宗教教师的宗教学校在校生仅为8,800人，而各类现代中学在校生总数高达92,479人。此外，沙特宗教大学业改革了专业配置，设置了社会学、教育学、工程学等专业。^{[3]70、82}70年代初，沙特大穆夫提去世后，政府取消该职务，同时设立司法部。一些学者指出，在沙特，海归派地位最高，世俗大学毕业居生中，宗教大学毕业生最低。但是，除伊拉克外，其他产油国的宗教界依然享有相当大的权力和影响，像沙特的宗教人士继续控制着宗教教育局、女子教育总局，并参与国家大政。在伊朗，宗教阶层遭受政府的强力压制，双方的关系极为紧张，这一状况直到伊斯兰革命后才出现根本转变。

(7) 外籍人员。这是一个极为独特而十分重要的新集团，尤其是在人口稀少的半岛六国，他们为当地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75年，六国外籍人员总人数为138.74万，其在劳动力中的比例为：阿曼34.0%，沙特43.0%，巴林39.6%，科威特69.4%，卡塔尔81.1%，阿联酋84.8%。^{[16]34}到1990年，沙特官方宣布的外劳数字已达到384.8万，占国内劳动力总数的66.7%。^{[3]151}从来源看，早期的中下层外劳主要是阿拉伯人，来自也门、埃及、约旦、巴勒斯坦、苏丹等，高级专家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进入70年代，以勤劳、守纪著称的亚洲人迅速增加，主要来自印度、

巴基斯坦、韩国、菲律宾、泰国、斯里兰卡。阿拉伯人一般从事行政管理、教学工作，而亚洲人则主要为建筑工人、产业工人、出租司机、保姆等。外劳工资低（与产油国公民比较），且与来源国收入挂钩，无法享受劳工法保障，更不能组织工会，其升职、携眷、旅行、归化等均受到严格限制。就归化而言，产油国一般只允许阿拉伯妇女入籍，且人数有限。产油国也通过严格的护照管理、工作期限控制来限制外劳人数的扩大，并通过封闭的劳工营、飞地型的工业城市等将外劳与本国相隔离。许多学者认为，本国人与外籍人员的对立是产油国社会分裂的主要表现之一。

(8) 民族与教派问题。这是产油国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方面。从民族看，伊拉克的库尔德人、伊朗的非波斯人是本地区重要的少数民族，而伊拉克、沙特和巴林等国的什叶派则是重要的少数教派。战后，一些国家一方面采取了压制少数群体的政策（如伊拉克对什叶派强硬的世俗化政策），另一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改变其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在伊拉克，1978年什叶派各省的小学生占全体人口的20.8%，只稍低于逊尼派省份（21.8%）；中学最高年级的学生在人口中的比例，什叶派省份仅为0.28%，而逊尼派省份为0.45%。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1975年冲突结束后，政府增加了投资，到1976年共向库尔德地区提供了11亿美元贷款，用于推动工业、水利、教育、医疗、公路和通讯设施的建设。70年代末在盛产石油的沙特东方省爆发了什叶派的反政府骚乱，原因之一是什叶派社会经济发展落后，骚乱后政府则加快了东方省的经济开发。

(9) 两极分化问题。在富裕的产油国，财富的两极分化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现象。在伊拉克，1971年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比农村居民高出25%；同年，城市中10%最高收入家庭是10%收入最低家庭收入的26倍。1977年，伊拉克和伊朗的贫困人口分别为150万和870万，占两国人口的13%和25%。^{[7]283}王室成员、企业家、承包商、经纪人和政府高官成为产油国城市的新富。同时，各国政府也采取措施大力发展社会福利，免除公民的税收负担，并对食品、住房、水电等提供大量补贴（外籍人员也可享受诸如食品补贴这样的福利），实行免费教育、医疗，但社会鸿沟依然存在。

总之，当代中东产油国经历了迅速而重大的社会变迁，实现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重大转变。其间，各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社会矛盾。在两伊，这种矛盾主要存在于国民内部，且相对尖锐，并最终导致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和伊战后伊拉克严重的民族、教派纷争。在海湾六国，矛盾相对缓和，并主要体现在本国国民与外籍移民之间。但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比，产油国的社会结构则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

[参考文献]

- [1] 王铁铮.沙特阿拉伯的国家与政治[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
- [2] Adnan A. Akkad. Development of Indigenous Manpower in Saudi Arabia [R]. Ph.D. diss., Fort Collins: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1983.
- [3] 黄民兴.沙特阿拉伯——一个产油国人力资源的发展[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
- [4] Saad Eddin Ibrahim. The New Arab Social Order: A Study of the Social Impact of Oil Wealth [M]. Boulder: Westview; London: Croom Helm, 1982.
- [5] Lois Beck. Tribes and the State in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Century Iran [M]//Philip S. Khouri and Joseph Kostiner eds. Tribes and State Form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Berkeley: St Martins Press, 1990.
- [6] Hossein Bashiriyyeh.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in Iran, 1962-1982 [M]. London & Canberra: Croom Helm; New York: St. Martin Press, 1984.
- [7] Alan Richards and John Waterbury. A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iddle East: State Clas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 [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0.
- [8] Adeed Dawisha and I. William Zartman. Beyond Coercion: The Durability of the Arab State [M]. London: Croom Helm, 1988.
- [9] Peter W. Wilson and Douglas F. Graham. Saudi Arabia: The Coming Storm [M]. New York: M.E. Sharpe, 1994.
- [10] Hazem Beblawi and Giacomo Luciani. The Rentier State [M]. London, New York, Sydney: Croom Helm Ltd.,1987.
- [11] Jill Crystal. Oil and Politics in the Gulf: rulers and merchants in Kuwait and Qatar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12] Y. S. F.萨巴赫.科威特的石油经济[M]//陈悠久, 译, 亚非问题研究, 第10集.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 [13] Nicholas Hopkins, Saad Eddin Ibrahim. Arab Society: Class, Gender, Power and Development[M]. Cairo: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1997.
- [14] 黄民兴.中东国家通史·伊拉克卷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15] Phebe Marr. The Modern History of Iraq [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5.
- [16] H. M. M. Arikat. The Arab Gulf Economy: A Demographic & Economic Profile [R].Economic Research Paper No. 17, Center for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 Durham: University of Durham, 1987.

The Social Change in the Oil-producing Countries in the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

HUANG Minxing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oil production, the oil-producing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East have experienced rapi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fter World War II, which has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ir social structure. Nomads have decreased in number; large landlords have become businessmen or modern farmers after the strike in land reform; small farmers have become cooperation members. They have used modern technology, or migrated to cities; large bourgeois experienced serious strike in Iraq, but expanded rapidly in other countries; traditional craftsmen and pedlars have had hard time, while “new middle class” increased in number; slaves were the only class which disappeared completely, industrial workers rose in force, and the poor were on the increase in cities; bureaucrat-capitalist class is a new class, while the traditional privileges of ulema are restricted; foreign workers as a new group are in serious opposition to the natives; the governments have taken “carrot and stick” policy towards minorities; the polarity between rich and poor exists in every country. To summarize, the social structure in the oil-producing countries lags behind their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the Gulf Region; the Middle East Issue; Oil-Producing Countries; Social Change

(责任编辑:孙德刚)